

于峻吉辦逆勢外交

——北國懷舊錄

朱家讓

北國苦寒，夜來沈寂，忽聞于大使峻吉兄在臺北以腦溢血謝世。惡耗震心弦，痛悼不勝。國家失了一個衷心愛國，兼有強烈黨性的公務員；政府丟去一位學貫中西能說能寫的卓越使節，以及在國際壇佔，迭經苦戰而功成不居的優秀騎士；在社會來說，我們又少了一位熱情厚道而又單純無猜的好朋友。

說實在話，我們和于大使的相識，雖將二十寒暑；平時由於人各一天，碰面不多，真正的私交成分有限，利害關係更談不到。故我們對他的認識，毋寧還在他的赤膽忠心的公務生活，以及溫煦樂羣的人性表現。大家認為他是一個腳踏兩個時代的外交官：一面承襲着祖國淳厚文化古道，再是具備着近代效率與戰鬥精神。無疑的，具有這些條件的人才已不多了，而今于氏之死，令人有「又弱一個」之感。

于大使自紐約總領事調升駐羅馬大使，正當大戰告終不久，歐洲大陸瘡痍滿目的時節。義大利在歐洲儘管文化遺產獨一無二，却因人多地貧，再加共黨叫囂，決不是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吃安逸飯的地方。舉一個例：中義外交戰後雖從未中斷，但始終未能正常化。我們有于大使經常駐義

，最近又有新人派去；但該國在臺北，則迄未設立使館，成了有往無來的單程交通。這種怪象，顯似義國左翼共黨及其夥伴阻撓與搗亂，以致政府畏手縮腳，不敢跟臺北過度接近。可是一方面儘管義大利的外交當局也有時為北平幫腔，並在聯合國裏幾次三番要求把中國代表權問題提出「研究」，但大旨方針掌握住，迄猶與中華民國保持友好關係，抑且貿易團、考察團一類，接觸不停，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駐義使節一部分的貢獻。于大使是一個絕對好動的人，平時最怕無事做，所以常常蹦蹦跳跳忙個不休。他靜不下來，想到就做，做必求成，因此在正號方面固然衝勁很大，而且不拘陳規，以赴事功。平時撥冗稍息，不是隨地睡睡，以稍調節其無分晝夜的心力勞動，即是沉思問題，想像力則又特別廣泛。因此在負號方面，帶些好大喜功的傾向。在外交部當局不時覺得他有些步驟錯亂，用錢無度，甚且越俎代庖，愛管閒事的情形，給上至部長，下至人事會計室，帶來些違反辦公事常例的困擾。

正如上述，我們與于大使不敢誇稱什麼深交，實無資格追述其生平。這個任務相信還有更適當的人為他擔負。但這些年來，他在義大利，以

及迭次奉派赴北非及美國等數不盡地區的外交活動，其用心，其努力，說句公平話，是不可磨滅的。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國與西班牙的復交成功，以及從此所展開的中西良好關係，「于峻吉」三個字，是無法抹煞的。正當中華民國與北非法國舊屬諸邦如摩洛哥、突尼西亞以及索馬利蘭等地希望通商交往的時際，于大使奔波往返，雖因種種事故，未全如願，但他那時首先叫出貿易打開外交，以經濟充實外交，不替替政府日後用農耕除下鄉外交的策略，指出了一條適應時代的嶄新大路。

就所記憶：于大使被派任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不過一次或二次。事在大西洋彼岸，他個人的表現，以及在他上司心目中的估價，自非外人所知。可以在此報道的，只是他在聯合國各專門單位或機構的會議場合，特別當政府初遷臺灣，國家處境空前艱苦，國際勢利眼咄咄逼人的開首幾年。又加政府拖欠國際機關會費，開會時投票權發生問題，（依一般國際組織章程，會員

作者簡介：朱家讓先生，江蘇浦東人，現任日內瓦國際勞工局高級專員。

國如欠費二年以上，即停止投票權，但如經與會國家三分之二認為情有可原，表決特准，仍得行使。而中央的訓令，則要堅守陣地，非特代表權不可有失，即投票權亦要保持。此外中國在這些機構中，原曾以戰後五強之一身份佔據不少「要津」，但這些委員或理事，究非終身，而須依章改選，而政府主管單位的指示，又要維持不墜。然彼時臺灣風雲險惡，識時務者早已對我敬而遠之，甚且擺出厭惡的面色，真是荆棘重重，何以交卷。但儘管形勢這樣困苦，于大使臉上嘻嘻哈哈，心裏則成竹在胸，游說忙，加上奔走忙，結果居然都操了勝算。

于大使戰後初到日內瓦，這國際都市來，是為了代表政府出席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的秋季會議，是接的張故理事彭春的工作。聯合國的經社理事會，每年七、八月間必在日內瓦召開，固有它的重要內容，但對中國來說，除了俄、印等國一小撮代表照例為代表權問題吵吵鬧鬧以外，沒有真正頭痛項目，更沒有投票權爭執。但另一方面因各專門機構首長必來列席，政府亦可趁機與這些首長們交涉些行政性的糾紛。這是一個轉移陣地的策略戰，因為在經社會的參加份子，不同該組織自身的組成分子，因此有些交涉，更較靈效。當時我國最困難的問題之一是若干國際機關對中國事件表面上雖抱中立態度，在其出版物中充滿為中共大陸宣傳資料。政府的常駐代表交涉無效，但在經社會大庭廣眾間，面對主管首長，提出詢問，這些人多數膽小怕事，事情就輕易解決了。

在日內瓦，于大使的主要活動是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一的十年間。先任國際勞工組織常年大會的政府首席代表，旋又於原任國勞理事段公使

茂調開升巴拿馬大使後繼他兼任理事。這些工作不消說都是在他羅馬及馬德里大使任內，政府為聲援這裏陣容而派他來的。現在臺北曾經到過日內瓦開會的勞工界有關的朋友都還記得，一九四九國府遷臺以後數年，在國勞大會中，我國代表團的遭遇是怎樣一種境況。臺灣可說得風雨飄搖，各國代表們的對我掉頭不理，有的冷嘲熱諷，等而上之，亦惟有以可憐與同情的眼光與我敷衍，患難中嗷嗷求友，除了少數富有正義感，或傳統友好國家外，能有什麼收穫。但由于大使所領導出席的每屆大會，憑他一馬當先，沉着應戰，不特代表權毫無錯失，且在形勢十分尷尬與極度驚險的氣氛中，每次都平安渡過大會准許我照常投票的表決的難關。

在這陰霾艱苦的數年中，于大使在日內瓦另一活躍的場合，是國際電信聯合會。這是在百歲以上資格最老的一個非政治性的國際機關，在中央的主管單位是交通部的郵電司，和電信總局，所以于大使在這方面的功績，這些單位的負責人，最較清楚。我們所記得的，于大使曾實際擔當過三屆電信大會（他們叫作全權大會）的重任：第一次在阿根廷，那是一九五二年，第二第三次兩次在日內瓦，那是一九五九和一九六五年。在這三次大會中，固然代表權的問題均須應付，但這些以後已成了公式，實在不須擔心。只是每次競選，以保持中國在該會中既得的兩席理事名位，則極吃力。第一，不比在聯合國安理會或國勞組織我俱保有常任理事地位，不受改選威脅，而今國家地位不同，非但無人奉承，還要遭受白眼。再則近十年來亞非新興國家蜂起，雖多數國際機構已酌加席次以廣容納，然僧多粥少，中華民國則很有被請退讓可能，至少說大家輪輪位，你

不好說不接受。如此這般，使中國在國際組織方面，惟有逐漸退却，即欲維持原狀而不可得。看數年來我在聯合國各單位席次的陸續喪失，即是一個寫照。

國際電信會至一九六五年大會為止，中國政府一向據有着行政理事會（一如董事會）理事一席及其國際頻率登記局（I.T.R.B）委員一席。但在一九六五這屆大會，登記局的委員地位失去了。這一個挫折如果用上述的國際環境角度來衡量，一點說不上什麼「人謀不臧」；反之我在行政理事會這個重要機構內的席次，則仍屹立不搖，所以每年四月選得有勞錢公南局長長途飛來瑞士一次，執行任務。然最緊張的一場奮鬥，還要算一九五九的那屆全權大會。當時國家處境不如今日，國際上媚共及姑息空氣四處瀰漫，因此交通部當局對我原有兩大席次的改選，日夜焦灼，除派有柳克述次長親自出馬外，並由外部加派得力幹員駐法陳代辦雄飛協同于大使積極佈署，以選舉為中心，全力以赴，結果兩隻地盤，保持無恙。

這些都是國家形勢最惡劣時，最不容易打的硬戰，如今論功行賞，倘全歸功于氏，自不公平，但身歷其境者，自可挺出作證，于大使的策略，奔走，交際，說服，實已發揮了他非常時期，戰國外交藝術之高峯，我們局外人自沒有眼看過他怎樣約縱連橫，為我拉票的手腕，但在緊要關頭，請客用快信發帖，不問政府預算有無，為了爭取時機，大場面的餐舞盛會照樣擺開，因添陪末座，則所習見。猶記得一九五九年那次的電信選舉，他並從羅馬專車載來伍伯就等中國男女聲樂家多位，在大宴會上獻唱出中西名曲，弄得與會賓客及其眷屬皆大歡喜，自然有利地影響了那

屆選舉的勝利。說句實在話，今日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是處在求人的地位，要達到某些目的，惟有運用機動，以期奏效。于大使似乎很體會這原則，他會降尊遷就，不拘形式，所以即是一個蕞爾小國的三等秘書，他也常常躬親請候，以求拉攏，他有誠摯的態度，而無油腔滑調的行徑，所謂「言忠信、行篤敬」的至善準則，他已身體力行的了。

像這類有血有肉的逆勢外交，決不是過去承平時時代，僅是穿起禮服，說說洋文者，所可想像而做到。這需要高度的機智與奮鬥精神，並能忍辱負重，不眠不休，才能吃得下，這口不太平的外交飯。又這些年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關，年繳鉅大會費，硬要廁身在內，爲的什麼？說穿了還不是爲了政治重於一切。所以每次參加開會，代表權投票權首須保住無虞，其他技術性問題，倒是次要。這樣看來，于大使在那段最動盪的期間受命於艱危之際，而能打出美好之戰，其對國家民族之貢獻，自不待言了。

再說于大使在國勢組織方面，亦有他自己的「一套作法」。他關心自己國家在該組織內所謂「重要工業國」的地位而不給動搖，却又設法把沉重的會費減低。在中國籍的職員方面，每次前來開會，必然抽閉電約訪晤，問長問短，如一家人，他對他們的工作與生活亦非常關心維護，並爲他們全心支持，事實俱在，有目共見。他的哲學是一切爲國家，別無他念，個人利害放在後面，所以我說他單純無猜，求之今日誠不可多得矣。

時下報紙上常見有「職業外交家」一詞，這個名詞表示一個外交人員出身科班，受過專業訓練，並以此爲終身職業。但另個錯覺，則是以外交爲吃飯工具，甚至持爲升官發財階梯。于大使

無疑是個職業外交家，但從其生前跡象看來，却從沒有拿它作個職業而存了敷衍交賬的心理。正相反，他有自動自發的熱愛祖國的赤誠，因此平日主意很多，凡有利於國家的，不管是否他分內工作，也輒直言建議。他喜歡上「萬言書」，又喜歡打長電報，以致弄得「不巧」，反給上級製造了麻煩，得到冷淡的反應。于大使忠於國民黨，也忠於三民主義，兼任過中央評議委員，對海外黨員的組織很起勁，他的堅強與鮮明的黨性，在日常談吐中自然地流露着。

但于大使給人留下頂深刻的印象，恐怕還在於他的和藹可親與慷慨熱情上。平日毫無官架子，不打官腔，對友朋僚輩以及任何過路外客，只要找到他，一概推誠招待，而且無分公卿走卒，一視同仁，不存絲毫勢利觀念。我國駐羅馬的使館，原是租的普通民房，爲了預算所限，館地狹隘不堪，因此人來客往，多數被請在飯店酒樓。臺北的官商各界曾過羅馬叨擾過他者，無不齒頰留芳，盛道于氏好客厚待，有逾常人。不少出版的遊記裏，並已寫入不少這些美好的回憶，什麼拿破崙妹子私邸改裝的俱樂部啦，羅馬郊外的高爾夫球場餐廳啦，都會是當年于大使款宴賓客的好去處。此外他常躬親視古跡或導遊歌臺舞榭，儘管他時間緊湊，但寧可在夜總會閉目打盹，却不願對嘉賓有所薄待。倘使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人自天飛來，他老人家一定又準時趨往機場，歡迎如儀了。

還有一個難得的特點，是他的「大智若愚」的風度，因爲他在當代外交家中，似是比较最不露鋒芒的一位大使了。于大使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又寫的一手好英文，他的詞句文采之美，在現代專家中定可算上一個。何況熟讀中西文史，

所以文稿裏引經據典，不由不令人折服。但他本人平日與人一起，又是多麼虛心謙沖。他素性好辯，不自炫，也從不批評人或背後說人壞話。喜歡聽人家的議論，而從不自以爲是，惟我獨尊。但話說回來，他有自己的主見，也不易輕易動搖。近年來他的屬員與他感情欠融洽，也許這也是原因之一。又于大使因爲平時公私事繁，又愛事必躬親，所以文章雖好，難免交卷略遲，在代表政府出席國勞大會時，每次登臺演說，例必最後一名。固然爲了多聽人的，以便綜合答覆，一面亦因日夜坐立不定，難得片刻靜下寫作，則惟有平時零碎塗下字條，到時上臺把這些字條從口袋裏挖出來，匆忙拼湊，應付場面。旁人看他無有準備爲他急壞，但他臨時剪裁，却即席編成一篇洋洋巨文。古人說倚馬成文，于大使文章的製作過程，確有這麼一套。

但另一方面于大使一生吃虧的，恐怕也在這些獨特的個性與作法上。熱心過分不一定事事中肯，也不一定能够討好；請客無度，固然過路考察的官商人等有口皆碑了，然用錢太多，積欠得無法收拾。反過來說，又何嘗不是浪費？再倘馭下大駱，狡黠者反爲所乘，羅馬的僑胞目親使館職員對於大使的無禮行爲，甚至當面拍桌，紀綱蕩然不成體統，迭爲不平。但綜括于大使所受是類委屈，恐還多的是，他都一一隱忍，而且接受下來了。他不宣傳，不訴苦，也不欲辯白，只是本着良心，堅忍不拔地工作，成敗毀譽在所不計。他數十年來始終是個單身漢，只有請客潤綽，愛排場，自身則寒酸萬分，平日旅行拖來拖去的，只是那隻捆捆柴柴的破皮箱，不知這回是否已和其老主人一同殉葬了？！

(一九六八、三、五、於日內瓦)